目　录

我在豫西工作的回忆……郭晓棠遗稿（1）

李杏村在洛阳及其被捕的经过……李连庆遗稿（16）

我对洛阳田赋的片断回忆……杨载东（24）

冯玉祥将军创办农村训练处概况

——附忆洛阳开展农村自治工作……李安民（28）

冯玉祥将军在洛阳开办军官学校的经过……李志勤（33）

第一战区作战人员研究训练班的片断回忆……王华农（36）

洛阳县义勇军干部训练所述略……何光远　张玉林（41）

“洛阳进修班”漫忆……孟　英（51）

郭芳五和他从事的社会公益事业……王华农（62）

河洛名儒许石衡……孙乃熏（75）

孙诒鼎自传……（78）

怀念张纯明先生……王疲梅（81）

河南省立八中、四师的概述……张玉林（93）

在省立第四师范上学的回忆……董纯熙（109）

我的母校——省立洛师的回忆片断……王永川（119）

河南大学在潭头……吴建业（124）

我对河南省战区二中的回忆……吴建业（130）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忆洛阳城区小学……卞西九(135)
四存中学在李村镇……刘耀德(138)

忆二十年代洛阳的足球运动……王兼三(143)
马信忱生平纪略……石玉文(148)

《中原日报》概述……杨载东(151)

洛阳回族社团组织简况……李　贤(154)
洛阳回族人民习俗……李　贤(161)

质疑·补充·订正

对《民国时期的洛阳田赋》一文的来信……王天奖(168)
对《洛阳文史资料》第五辑几文的补正……陆衣波(171)
对《大屯高跷与现代曲剧》的补正…李文修　李振山(173)
对《洛阳学生响应一二·九爱国运动》的补正…许剑(175)
国民党河南省政府迁洛的时间……马绍元(176)

附　录

修订《洛阳市征集文史资料参考提纲》及稿约……(179)

补　白

刘子久初到河南(23)　商震(27)　冯玉祥主豫时的五个模范县(35)　李杏村请陶毅为师(50)　狮吼剧团之始建(61)　洛阳军需独立会议(74)　老舍来洛阳(77)　一个补充兵训练处(80)　朝鲜流亡政府主席之死(92)　"自由"、"平等"等县的来历(108)　帝王思想的延续在古都(123)　灵山寺(134)　"友石山庄"与"蛰庐"(147)　董家祠堂(160)　纪廉泉自挽联(176)

我在豫西工作的回忆

郭晓棠　遗稿

1936年至1941年期间，中共豫西党组织的活动，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一、建立阶段，自1936年秋至1937年夏，也可以叫工委时期；二、发展阶段，自1937年夏至1939年春，也可以叫特委时期；三、巩固阶段，自1939年夏至1941年夏，也可以叫省委时期，这个时期又可分为两段即豫西省委（1939年初至1939年秋）和河南省委（1939年冬至1941年夏）；四、撤退阶段，1941年夏至1943年春，省委撤往延安。兹就记忆所及，叙述于后：

一、工委时期，豫西党组织的建立经过

1936年夏，在许昌，我同当时河南党的负责人沈东平同志商量：利用社会关系，我到洛阳开辟豫西党的工作。8月底，我到洛阳，找到我初中时的同学，时任洛阳私立复旦中学教务主任张朝俊（又名张俊），经他介绍，我在该校教书。听说省立洛阳中学有些进步教员，通过该校校长周筱沛，认识了吴芝圃（当时叫吴纯圃）、曲乃生等，谈到时事，大家对抗日救亡运动很是热心。因为都是做教育工作的，我提议成立一个“国防教育社”便于联系活动。两校教员十余人，在邙山岭“上清宫”里召开了成立会。在会上，

我把当时政治形势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作了介绍，吴芝圃也讲了话，并选我和吴芝圃、郝德青（当时洛中教务主任）三人负责，以后经常到吴家开会，谈形势、谈工作。吴提出要求党的领导。解决他的党籍问题，10月间，楚明同志（当时在郑州工作）到洛阳找我，我叫他去同吴谈话。他回来向我汇报：吴是1925年的老党员，失掉关系后，来豫西教书，先后任教于偃师中学、洛阳中学，在师生中做了许多工作。所以决定解决他和曲乃生（吴介绍的）的党籍问题。同时，吴又介绍他在偃师成立“民族解放大同盟”的情况，我就派楚明同志前往建立了一个党支部，有武宪周、曹文若、刘福德三个人。为了有组织、有领导地开辟豫西党的工作，我们于10月间成立了临时性推动工作的领导机构——豫西工委，我任书记，吴任组织，曲任宣传。这期间，工委和“国防教育社”在洛中、复旦师生中，经常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教育。这年冬，绥远抗战爆发，我们就发动师生进行援绥运动，到街头进行宣传和募捐，并发表宣言。宣言是我起草的，由于开头写的是：“全国人民大众”，后面没有写什么口号，如蒋委员长万岁之类，因此引起国民党反动派的怀疑，认为援绥抗战可能有政治背景。同时上海“七君子”案发生，引起全国注意。1937年2月，我离开洛阳到偃师中学教书，大力开展了偃师县的建党工作。曲乃生活动任洛宁县师校长，开辟洛宁县党的工作。这样一来，豫西工委工作就逐步展开了。洛阳的反动派对洛中的革命活动很注意，以洛阳职业学校教务主任马芳鼎（复兴社小头头）为首，私刻省立洛阳初级中学学生自治会图章，假借名义，伪造营救上海“七君子”的宣言，造谣洛中有“人民阵线派”，从政治上打击洛中师

生。经由我方寻查刻字铺发现伪造人为马某，并公开在社会上揭穿，其阴谋败露，马被撤职，扣押解汴，我方完全胜利。1937年上半年，洛阳、偃师、洛宁等县党的组织，建立了县委，有相当的发展。

1937年2月，我到偃师建党时，发现“民族解放大同盟”简称“民解”，和共产党的界限有些不清，决定要一个一个地审查，吸收入党。“民解”是一些失掉关系的党员，在1935年左右成立的革命群众组织，他们的活动方式、宣传口号同党一样，就是没有党的领导。他们说一旦找上了党的关系，就变为共产党。1936年10月建立了第一支部，以后如何发展，不太严格，可能宣布找上党的关系了，但是没有严格履行入党手续。我去后规定入党手续，有明确的介绍人，填誓词（中央规定的），举行入党仪式，候补期3—6个月，过组织生活，按月交纳党费等，这样就把党员和群众的界限划清了，在偃师建党中这是一件重要事件。我在偃师一年，1937年底偃师县各级党的组织都建立起来了，县委、区委、支部、小组都有，党员近300人。特别是“七七”事变后，国共两党合作，统一战线形成，政治形势顺利，工作发展很快。

二、特委时期，豫西党组织的大发展

1937年8月，豫西工委改为豫西特委，到1938年底结束，约为一年半时间。特委中心在洛阳，书记是吴芝圃，副书记是王志杰（二人均为洛中教员），我任组织部长，纪西（原名席国光）、王祝道作具体工作，并到各县联系，受书记直接领导。1938年初河南省委要我到十五军干训班工作，5月中旬省委又调我回豫西特委（我在军队工作期间吴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芝圃调武宪周到特委代理我的组织部长），4月，吴已调离特委到开封担任省委工作。我返洛后发现组织部工作有问题，主要是武宪周不负责任，也无工作能力。从延安学习回来的纪、王对武的领导也不满意，经常发生冲突，于是我主持洛中支部开会，批判了武，经特委决定调武到省委党训班（在竹沟）去学习。接着特委改组，书记是陈少敏，组织是纪西，宣传是我，统战是王志杰。陈任书记约二、三个月调省任组织部长，约在八、九月间，省委调刘子光接任书记。

特委时期是豫西党组织大发展的时期。从“七七事变”到1938年底武汉失守，这一年半期间，是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形成后政治环境比较顺利的时期。共产党、八路军与豫西人民只有一河之隔，我党我军在豫西人民心目中有着很高的威望。我党报纸书刊在各阶层人士中间，可以公开广泛地传播，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爱国热情普遍高涨，抗日救亡运动的热潮汹涌澎湃，不可阻挡。这是豫西党的大发展的客观有利条件，同时凡是有党组织的地区和单位，抗日救国的群众运动就搞得轰轰烈烈。否则，就冷冷清清。比如当时我们领导的“孩子剧团”和“老婆剧团”，轰动一时，1938年还到延安演出，受到毛主席的亲切接见。

豫西特委领导下的各级党组织得到普遍的发展。豫西地区从郑州到潼关东西近千里，从黄河到伏牛山和嵩山南北约三四百里，共有二十七八个县市，绝大多数都有或多或少、或大或小的党组织。最大的县如偃师、洛阳等，有几百或近千名党员，而有些县却很少，甚至还有空白县。到1938年底，豫西党大约有二千多名党员。

这个时期豫西党的主要任务：1、发展党员。2、教育

新党员，各县区开办新党员集训班，三五人、三二天等小型形式，适合秘密环境。知识分子党员看党报和党的刊物。对于农民党员，分编课本，组织学习。“七七事变”后，特委办过一个刊物名叫《战旗》，内容有宣传抗战理论、分析政治形势、发动群众抗战等，公开发行，出了四期。洛阳《行都日报》是我党可以控制公开发行的民办报纸，编辑主任周肇瑚是党员，社长郭担宇（孟津县人）接受我八路军办事处的津贴和支持。该报进步，在群众中有较好的影响。3、通过党员掌握国民党基层行政组织（如保甲、联保处等）的地方武装和民间枪枝。4、利用各种关系开展各阶层的抗日统一战线工作。5、建立和参加各种抗日救国的群众组织，如青年、妇女等都有。1938年下半年，省委书记朱理治、省委统战部长彭雪枫来到洛阳召开特委会议，研究对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的统战工作。彭雪枫汇报了他同程潜谈话的情形，建议如何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等问题。程潜认为那是你们共产党的一套，他不大感兴趣。彭走后决定由王志杰以八路军代表名义，在第一战区同程潜进行统一战线工作。这年秋冬，第一战区承认我们八路军在洛阳设立的通讯处，由刘子光兼主任，地址在洛阳城南门内往西一条小胡同里。

这个期间，在豫西党领导下，发生过两次反顽固派斗争事件。一次是1937年寒假，偃师县教育界反对县教育局长周培元（复兴或CC分子）的斗争。这次斗争，党发动了全县中小学师生，向偃师县政府请愿，包围教育局。由于省教育厅长鲁荡平、洛阳专员李杏村和偃师县长大力支持周培元，扣押了领导这次斗争的偃中校长刘普育同志（后改名叶林），

斗争失败了。又一次，1938年暑假，河南省教育厅长鲁荡平和洛阳专区国民党党务指导员刘锡五，造谣中伤，攻击洛中，发生撤换校长、解聘教员事件。我们洛中师生向国民党顽固派提出抗议，发表宣言《我们的申诉》（是我起草的），向社会上说明真象，我们没有错误，“抗日无罪”。

1938年冬，党的扩大六届六中全会后，即武汉失守前后，刘少奇同志以“视察”化名来到河南，利用渑池东关八路军兵站作掩护，召开豫西特委、县委干部会议，传达六中全会的报告和决议。对当时豫西的形势和任务，作了讨论、研究，并有决议和指示。参加人员，特委刘子久、纪西、王志杰、郭晓棠等。此外有吴应先、吴祖贻、付希晨、李汉周、邵文杰、赵立命、蔡迈轮、杨松年、陈年东、张如意、张剑石、刘道安等约30余人。

刘少奇同志在会上传达了毛主席在六中全会上做的《论新阶段》报告，还传达了六中全会为了适应抗日斗争的需要，应该调整各地方党组织机构依战略区来划分的决定。刘子久同志在会上讲了豫西的形势和任务。最后刘少奇同志对豫西工作做了指示，大体如下：1、大力发展党，自上而下地建立各县党的组织，可以派三五人先组成县委，自上而下开展全县工作。2、党员条件（主要指农民），只要知道今天是抗日，将来要共产；知道八路军是自己的军队，能给八路军当向导、带路就行。3、积极准备武装，迎接抗日游击战斗。4、按战略区划，将豫西特委改为豫西省委，将来转为豫西区党委。5、省委开办党训班，训练党员干部。6、向敌后大量输送干部，中小学教师、学生送出很多。会议开了三天，立即组成了豫西省委。多数参加会议人员留下，少数人回去了。

三、省委时期，以整顿巩固，精干隐蔽为主的工作活动

渑池会议结束，豫西省委成立，省委党训班开办。这次干部变更如下：书记刘子久，组织部长纪西，宣传部长郭晓棠，统战部长王志杰，青年部长吴祖贻，军委刘向三（八路军洛阳办事处处长，参加省委任军委、常委），妇委吴应先（又名吴平）。在省委管辖下，成立五个地方委员会，以“仁、义、礼、智、信”五个字为代号。以新郑县为中心的新密地委（仁），由纪西负责领导，主要干部有刘清源、苗树棠、李毅章等。洛阳地委（义），由陈年东（河北人）任书记，主要干部有李汉周、付希晨、张如意等。宜阳地委（礼），书记先是韩达生，后是邵文杰，主要干部有张剑石、曲乃生。陕灵地区（智），负责干部有关周光、赵立命（又名赵群一）、蔡迈轮、赵致平、杨松年（又名杨朗桥）。伊阳鲁山地区（信），负责人王舟平。上述为1939年的大体情况。

党训班于1939年初开办两期，每期30—40人，为期三周，共约一个半月，训练区级以上干部七八十人。省委决定我任班主任，由吴祖贻和延安派来的红军师长徐时奎参加，成立三人领导小组。吴讲《党的建设》，我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徐讲《游击战术》共三门课。此外，我还做过时事报告。

当训练班第一期开始时，刘少奇同志还未走，他做了两个报告：一个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在一张白麻纸上用毛笔写了几条，讲了两个多小时，内容和后来发表的大题目差不多，这可能是他第一次讲的。又一个是中共党史报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告，有一个简要的笔记，约一二千字。后来在省委出版的油印小报《前锋》上刊登过。很快，刘少奇同志到确山（竹沟）建立中原局任书记。河南省委撤销，分为豫南、豫西两个省委。原河南省委书记朱理治任中原局组织部长，仍领导豫西工作。

1939年上半年，豫西党的工作，在一些薄弱地区还有一些发展，但是在一些比较发展的地区，出现了停顿的现象，推动工作有了困难。这与当时国内政治形势有关系。武汉失守，抗日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国民党顽固派，开始加紧妥协投降的活动，国共关系有恶化的趋势。国民党颁发什么“防止异党活动办法”，下令凡属国民党管辖的机关学校的公教人员，必须一律参加国民党。“三青团”成立了，“劳动营”成立了，对抗战初期表现积极进步的爱国革命青年和民主人士，特别是共产党人，更是仇恨，进行造谣中伤，政治迫害。豫西党是在过去两年顺利的政治环境下大发展起来的，是没有经过战斗考验的新组织，这是一个关键性时期。抗战初，由于抗日救亡运动的革命高潮而卷进党内的，有各种不同表现，在困难面前，有的消极怠工了，有的畏难逃跑了，有的被捕自首了，有的自动投敌叛变了。而更多的党员干部在这期间，在战斗洗礼中得到锻炼而坚强起来了。豫西党在国民党发动两次反共高潮（1939年——1940年山西、河北事件和1941年春皖南事变前后）的政治逆流中，虽然遭受一些破坏和损失，但是各级领导骨干（县级以上）除个别被捕变节外，基本上大多数都还是保留下来了。在这期间，豫西党先后向豫东、华北、鄂中等敌后输送了大批党员、干部。向延安输送党员、干部学习的也很多。

从1939年起，豫西党组织，基本上停止了发展。这以后的主要工作任务，大体如下：1、整顿巩固党的组织；2、对党员进行气节教育；3、开展反对顽固派分子的斗争；4、执行审查干部，精干隐蔽的工作方针；5、反自首、反内奸的斗争。这是根据什么呢？由于当时有的地方组织出现瘫痪现象，比如省委决定改组偃师县委，成立整顿工作组，由王志杰同志负责进行。由于党组织处在敌人进攻面前，有的党员思想动摇，甚至自首变节，所以对党员必须进行气节教育。为了反对顽固分子的进攻，加强党组织的战斗力，开展反顽固分子的斗争。如卢氏县反对中小学校校长、洛中支部反对三青团校长王果正；农村里发动群众反对保甲长、坏联保主任的斗争，这些人中贪污腐化、买卖壮丁罪恶很多。

在敌人进攻形势下，正是考验党员和组织的机会。1939年上半年，洛阳开始发生逮捕共产党员事件，首先是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政训处长李世璋（第三党、统战对象，与程潜关系好）被复兴社分子袁守谦所代替。内部组织，我党两党员科长李××、王××被撤职扣押，李解西安、王在长官部扣押若干天，经活动获释。其次，洛阳铁路支部（刘子久、王志杰直接领导，抗日工作很活跃）在1939年春或夏发生破坏，有三个党员被捕，不久释放。第三，密县交通因送党的书刊宣传品由洛返密在路上被查获，供出郭磊（女），牵连到县委尚寅宾、王东旭二人。尚、王后来送往延安学习。第四，1939年最大反共事件，就是11月间发生的竹沟事变。

这年十月间，刘少奇同志第二次由延安来豫西，住在洛阳八路军办事处，还到过西工长官部赵卫立煌的宴。刘在洛阳召开省委会，刘子久、王志杰和我都参加了。这时刘子

久书记兼洛办处长（1939年夏到1940年夏住在洛办，我们都住在外边）。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同志传达了毛主席的《反投降提纲》，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国共关系将趋紧张，在国民党白色区中的一个红点，迟早要给抹掉，所以要把确山竹沟中原局撤往敌后。刘少奇同志带一批干部到苏北去了，朱理治、陈少敏带一批干部到鄂中去了。豫西豫南两省委合并，由刘子久同志任河南省委书记。

1939年竹沟事变之后，接着就是这年的冬天，第一次反共高潮的来到。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洛阳“劳动营”成立了，下令公教人员必须加入国民党，逮捕事件不断发生，敌人的自首内奸政策开始实行了。1940年上半年，偃师中学5个教员登报发表“反共启事”，洛阳复旦中学教员李品清等被捕自首，周之焕、马超五被捕，灵宝县中教员武宪周秘密投敌当了叛徒等一系列事件。根据这种情况，我们按照中央的指示和地方特点进行了尖锐的也是艰巨的斗争。

敌人为了“限制异党活动”，下令凡是机关学校的公教人员必须一律加入国民党。认为凡是加入国民党，共产党就不要了，这样就可以限制共产党在国民党政府机关、学校的活动。我们根据中央的指示，大意是凡属上述情形，集体加入国民党者，可以允许我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免暴露党的政治面目。我们规定共产党员必须加入国民党者，应该事前请示或事后报告，不得隐瞒，否则应受党纪处分。我们还根据中央指示，凡从“劳动营”出来的，一律不接党的关系，这是杜绝敌人自首内奸政策的一条重要方法。

1940年春夏之际，河南主要领导干部都到延安，准备参加七大开会，刘子久四五月间去，七月间返回洛阳，在这二

三个月期间，我留在豫西主持工作。这时洛办工作由王吉人负责，有要事同我商量。这时我住在洛南大屯村（从1939年春到1940夏，由红十字会郭绍兴同志掩护），有事到洛办去，经常在外边跑工作。在这期间袁晓轩接任洛办处长，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先后来到洛阳。五月间，彭德怀同志到洛，在洛办同我和王吉人谈话，讲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的国际国内形势。六七月间，朱德同志来洛阳召我在洛办谈话，我汇报地方情况讲到，国民党政府求人举办地方行政人员训练班时，朱德指示，要尽量动员一些党员和进步人士去，必须掌握其基层行政组织。

1940年7月间，刘子久同志从延安返回，途经西安打电报（由洛办转），要我到西安办事处。在那里，我写了一份自传，交林伯渠同志审查，又汇报河南几个月的情况（参加人有刘子久、张继桢），决定回河南执行当时中央关于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工作方针，即审查干部、精干隐蔽的工作方针（这是1940年“七七事变”抗战三周年中央决定的）。刘、张从延安回来，中央对他们指示：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安排分工，不与洛办在一起，另外设电台与中央联系。可是1939年以来，省委书记兼洛办处长刘子久同志一直住在洛办工作，一时还分不开。特别是调来各地干部，作审查谈话没有合适地方，所以同林老商量，还得利用洛办作审干工作。刘子久同志回到洛阳，仍住在洛办，调各地干部来到洛办谈话，一方面审查干部，一方面重新部署工作。由于干部工作地区变更很大，一直搞了几个月。开始我也在洛办住了一段，帮助刘子久同志审干和布置工作。10月间，刘子久同志派到嵩县伏牛山中寻找筹设电台地址，没有找到合适的地

方。11月后，派我到豫西南检查精干隐蔽方针执行情况；同时寻找筹备电台地址，决定在南召西部伏牛山中的马市坪一带设立电台。那里僻静，且可由我党掌握的地方武装作掩护，比较安全。12月底，我返回叶县与张维桢同志见面后到舞阳开省委会议，一切由张维桢同志事前安排好了。会议在舞阳城东南五里一个村庄的同情分子家里，以请客名义开会。参加人有刘子久、张维桢、张旺午和我4人。会上我汇报了到豫西南检查工作的情况，最后刘子久同志宣布中央命令，调他到淮北工作，由张维桢接任省委书记，张住在豫中兼顾豫西南工作，全面领导。我分工返回豫西工作，张旺午分工豫南工作。

1941年上半年，我负责豫西工作期间，正是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时候，元月底皖南事变发生了，国共关系紧张，地区辽阔，干部缺乏，情况复杂。这期内，有几件大事叙述于后：

皖南事变后，我感到有国共分裂，爆发内战的可能，当时洛办电台传来的消息很多。大概是二三月间，华中局发给河南省委一个电报，大意是：皖南事变发生，有国共分裂，爆发内战的危险。一旦内战发生，新四军第四师攻入豫西。交河南省委的紧急任务是：积极准备反内战的游击战争。洛办接到此电报后，通知我到洛办商量，研究办法。袁晓轩、徐力行和我，都认为事关紧急，研究了几个办法：（1）利用"工会"召开干部会议的名义，短期训练游击干部（约十来天），由省委通知各县干部，徐力行主持其事。这是袁、徐提出我同意的，并交管交通工作的余致和负责通知；（2）徐力行以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彭雪枫的代表名义，到豫西南镇平县同地方自治派首领王金声（县司令）进行统战工作，讲

形势，讲前途，拉关系（自治派武装力量，在中下层中有很多党员、民先、进步分子）；（3）一旦国共分裂，内战发生，洛办不能存在，人员要疏散转移，他们已作准备；（4）洛办通知省委：中央发给省委的电台已到，指令洛办协助省委建立，技术、人员都由洛办安排抽调。（曾小英等二人到南召去作筹建工作，因未建成又返回洛办。）以上几件事都进行了，由洛办秘书主任徐力行负责主持。与此同时，延安中央组织部发给河南省委一个电报，大意是指示共产党员被捕如何对付敌人的办法。

上述两件大事，我很快派交通员焦万宝到舞阳请示张维桢前来商讨，并将两个电报都转给张看了。在积极准备反内战游击战争问题上，他不同意开训练班，可是已通知了，马上再去通知已来不及了。在研究第二个电报时，我们认为是个绝密文件，只能领导干部掌握，不能普遍传达；只能对有被捕危险而一时又无法撤走的人，由负责人以个人名义，个别安排交待，绝对保密。由我口头上传达这个指示的，记得有付希晨、高文理二人，余致和也知道。这个指示由地委书记传达到县委书记。当利用“工会”名义，刚刚集合时，余致和在洛阳遇到特务和熟人而被捕了，听说还有两人被捕，徐力行同志逃走了。

四、五月间，延安中央决定派人来传达大撤退的指示。

四、雀委迁延——河南党员干部大撤退的经过

派来豫西通知撤退工作的是苗树棠同志，他不知道我的地址，是通过伊川县五区区长王景琦（党员，他们过去是熟人）设法找我。他对王在政治上有无变化不了解，有所警

惕，表示他是从延安出来，被捕入西安劳动营后，逃跑出来找党关系的。王报告县委，县委报告地委，地委书记付希晨向我反映过上述情况。为了党组织安全，从劳动营出来不接关系。小苗等了多天，要求见我，我估计他从延安出来一定有任务，应该见他，又无把握。所以不得已，我指示王景琦同志对苗考验一番，以明真相。不料王作得有些过火，使同志受了虚惊……后来我俩终于见面了，小苗传达了中央撤退的指示和一个重要的情报。

中央关于“精干隐蔽”的政策正在贯彻执行，还没有发现严重的暴露情形，所以对中央撤退工作指示，没有下决心。想请示中央后，再作最后决定。请示电文大意是：小苗所谈情况，不符事实（苗传达中央从敌人那里得到关于河南党组织机构和各级负责人名单，我们看了，组织机构和人员都不符合事实，断言是一个“假情报”。）是否可以通融，灵活办理。中央很快回电，大意是：坚决执行命令，不要犹豫。接到中央回电，我坚决执行命令，将豫西地区，分为洛西和洛东，分别派人迅速通知区级以上干部全部撤退。小苗、老苗通知洛西各县，我和付希晨通知洛东各县。整个来说，布署撤退工作顺利。

1941年6月21日，我同苗树棠一路通过封锁线，进入陕甘宁边区，到了延安。当年10月，在延安看到《河南民国日报》上刊登付希晨的“自首启事”大意是：我因过去思想左倾，交友不慎，误入歧途，今后愿在政府领导下，从事抗日救国工作，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努力等之类的话。省委研究了付的“启事”，知道他是按照上述那个电报指示办事的。所以决定派张思贤同志回洛阳，一面大力撤退党员，以防万一，一面

设法找到付希晨，摸清底细（付张二人长期在一起工作，关系较好，付的家庭，张照顾很多）。张到伊川通过付的家庭在洛阳找到了付希晨，了解付的被捕经过：付到洛后，省三青团李明章（付的同学）问付，付答以抗战初，在洛中教书时，同吴芝圃有过关系，吴走后就没有关系了（当时吴在新四军第四师）。张动员付来延安，他表示有困难，愿留在国民党区，将来为党作贡献。付请张向省委汇报，请放心……。张表示满意。张思贤同志返回延安后，把上述情况向省委做了汇报。

河南省委迁到延安，继续进行撤退工作，直到1943年春才停止。1941年下半年，在延安的省委，书记是张维桢，组织部长是范拱之（女），我仍任宣传部长（1940年夏季以后我兼任统战部长），还有王志杰、王国华等。1942年春省委改组，王志杰任书记，我、范拱之仍旧，张、王先后到党校学习。省委机关以“边区工作团”名义，迁往关中分区马栏镇，约一年，于1943年3月底结束。我们进中央党校学习，不久开始整风、审干运动和“抢救”失足者运动。

1967年9月

（本文作者郭晓棠，河南沁阳县人，1910年生，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豫西工委书记、豫西特委组织、宣传部长，豫西省委、河南省委委员、宣传部长。解放后，任河南大学文学院副院长，郑州大学常务副校长，中共河南省委委员、宣传部副部长，省人大代表、省政协常委。1969年3月病逝。）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